

主题研究：曹禺戏剧艺术美新探

# 存在的“人”与人的“存在”

## ——曹禺悲剧关于存在命题的探询

陈坚, 贾敏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曹禺关于人类与宇宙的悲剧意识来自于对人深刻的“存在”之思。人类往往无法剥离存在的悲剧性处境以及焦虑,即使他们用行动力自主选择并确证自我存在。悲剧是存在的最高形式,虽然意味着肉体的毁灭,但是生命本质获得了充盈。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希腊悲剧更多凸现悲剧人物的英雄性与无畏性,而曹禺却更多暴露人的存在困境,表现人的有罪性与渺小性。但是曹禺并没有导入西方存在主义的虚无与荒诞而彻底否定人的存在意义,他渴望为了人能够诗意地栖居而建立一个有爱、有信仰的理想的存在世界。

[关键词] 处境意识;存在焦虑;生命力选择;存在与人

[中图分类号] I0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6-0124-07

悲剧是一种试图窥视人类“存在”秘密的美学形态,任何一出悲剧,无论是源于古希腊的背景、基督教的背景或其他背景都是如此。人类至今仍置身于“存在”之中感受各种矛盾与困惑,只有悲剧的力量才能启发人类对于一切存在的必然性的真正顿悟。存在命题,会让人自然联想起西方存在主义,但由于存在主义本身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规整的理论体系,因而,笔者并不想盲目借用存在主义理论并将其移植于曹禺悲剧的研究,也不想像存在主义大师一样去寻求“存在”形而上学的抽象意义,正如黑泽尔·E·巴恩斯所说:“我确实无法看出存在、存在与否对生存的人最终有什么不同”(1)(p.456)。笔者所关心的“存在”,更多地指向人类现实的存在境遇、存在状态以及存在体验,尽管它所指涉的实质内容并没有脱离存在主义的范畴。

越深刻的灵魂越能体会人生的悲剧性,曹禺正是凭借自己细腻敏感的生存认知触及了人类隐蔽于内心深处的“存在”意识,他试图体察人类“存在”所包纳的一切世态炎凉,并将自我的存在体验最终上升为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这或许是个性使然,或许是因为早期接触基督教触动了他年青而又善感的灵魂。曹禺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却同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一样拥有深沉的基督宗教情感。在上帝的启示下,他执著地探究人类存在的奥秘:“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吧!”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甚至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面找出一条路来。(2)(p.107)

[收稿日期] 2004-03-03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陈坚(1937-)男,江苏南通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戏剧史;2.贾敏(1980-)女,浙江义乌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戏剧。

## 一、绝望处境与‘存在’焦虑

雅斯贝尔斯说,有处境意识即意识到生存。曹禺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进行着精神上或行动上的困兽之斗,无奈只是徒劳,因为他预先设置了一个个无法挣脱的困境。在《<雷雨>序》中,曹禺谈到自己的创作冲动正是源于“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及其背后神秘的主宰”,这种难以名状的力量引发了他对人生悲剧性的感受。曹禺从宇宙人生的“神秘”以及神的启示中获取了人类必须面对且无法逾越的悲剧性处境的认知。这种处境乃是让人在超越理性之上的偶然性力量的支配下决然告别一切先验判断,一切由观念构造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告别一切稳靠的根基和基础时所必然遭遇的处境,这与上帝的启示即个体灵魂由于其无根基性而不得不经历与遭受生存悖论的威胁恰巧吻合,上帝也在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存在。

曹禺的早期剧作如《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家》都体现了一种处境意识。《原野》的非现实主义倾向性带有表现主义的色彩。主人公仇虎带着满腔的复仇情绪梦游般潜回郁郁苍苍的“原野”之中,整个原野除了一栋神秘的老宅,一片黑林子,还有一座不远处的寺庙外,别无其他。这里只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和一群背负心灵之债的灵魂,尤其是深邃黑暗、幽昧恐怖的黑林子更是充满了浓郁的象征意味。“森林黑幽幽……罩住森林里的原始残酷”;“这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sup>[3] p.626</sup>。“黑林子”是仇虎处境的象征,仇虎最终迷失于黑林子中而精神几近错乱,意味着他最终无法摆脱自己的心魔,也意味着仇虎无法彻底挣脱自己的悲剧性处境。“雷雨”其实也蕴涵了一种关于处境的渲染,雷雨到来之前的燥热郁闷正是原始生命力不堪极度压抑而即将迸发的征兆;“日出”虽然意旨冲破黑暗后的光明世界与美好憧憬,但理想毕竟还是理想,曹禺不得不将人类的处境呈现出来给人看,陈白露最终还是意识到太阳不是她的,她要睡了;“家”同样是令人窒息的难以挣脱的桎梏,它试图用亲情血缘维系表面仅存的安宁,但却无法掩饰内心里的虚伪与专制。悲剧人物对于自己的处境不论是挣扎反抗还是忍受屈从,他们都在各自的存在境遇中死了、疯了,活得完全没有意义。在曹禺眼里这是命定的必然结局,因为有太多非理性,被称之为命运的因素在和人类开玩笑,由此,它决定了任何个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在悲剧性处境中生存着。

如果仅仅将曹禺的处境意识外化为一种象征形式来考虑显然是不够的,其实有必要获得深层内涵的认同。“处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道德伦理的规条与束缚,意味着难以用理理解的命运力量,还意味着所有异化了人类本质的因素。与悲剧性存在处境相关的是人的焦虑。焦虑是在不能应付某一特殊境遇的威胁时所产生的痛苦之情,焦虑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范畴<sup>[4] p.20</sup>。蒂利希曾阐述过焦虑分三种:如果威胁本体上的自我肯定,则产生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如果威胁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则产生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如果威胁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则产生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这三种焦虑虽有所不同,但又不可割裂,其表现常常以一种为主而兼有其余两种,而三者共同造成的一种极端境遇就叫做“绝望”<sup>[5] p.3</sup>。曹禺笔下的人物几乎个个处于焦虑的困境,只不过在程度上深浅有异罢了。

蘩漪是一个果敢阴鸷、对爱充满疯狂激情的接近神经质的女人。她的心中燃烧着郁积的火,她的眼光会流露出失望的痛苦与幽怨,她年轻的心不甘于忍受周公馆的沉闷压抑,无法忍受无爱的婚姻。她焦虑并不是因为她困于道德,而是因为她无法得到任何男人的爱,无法获得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因而逐渐走向孤僻的极端。蘩漪对周冲疯狂地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sup>[6] p.196</sup>曹禺曾试图将蘩漪推向情欲与伦理对立的巅峰,但道德与爱情在她身上力量对比太悬殊,即使她在道德上有过愧疚与歉意,可一旦与爱情相比就显得太

微不足道了,她毫无顾忌地用最炽热的情,最强悍的心张扬了自己的情与欲。她渴望在心爱的人面前获得尊严与确认,可是爱情却是人软弱与孤单的明证;“你与你所爱的对象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你一刻也不会停止跟它斗争,没有它,你既无法生活,也无法解决自己命运的基本问题”<sup>¶7</sup>(p.180)。蔡漪的焦虑来自于她使自己成为爱情的奴役,爱情成了束缚“自我”的网罗。她渴望占有周萍,渴望在周萍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是她最终失败了,她无法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感,反而因为对爱情的偏执而直接推进了悲剧的发生。

《原野》悲剧的本质在于,它热情讴歌人的感性生命,赞美冲破一切束缚的原始野性,同时又意识到理性文明自身的合理性,于是又否定了野性的反抗。仇虎正是陷于道德理性的威胁而产生罪过与谴责的焦虑的。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灵魂的自身搏击,最终因为无法挣脱自我悖论的心魔而精神恍惚以至于最终迷失。应当感慨命运弄人,当血气方刚、具有强大生命意志力的仇虎孤注一掷要报仇,可偏偏却没有了当年的仇人,因此,他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一边是仇人无辜的儿子,另一边却是惨遭迫害的亲人,但仇虎时刻提醒自己杀父仇人不共戴天,所以从选择复仇到行动的过程中,杀气腾腾的仇虎并没有太多的犹豫便遵从了自己的生命意志,他要报仇,这个意念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哪怕他知道自己会承受道德与良知的谴责,可他选择复仇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说他可以忍受焦大星的死,是因为他始终坚信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但小黑子的死却激发了仇虎强烈的罪恶感。“天哪!我只杀了孩子的父亲,那是报我仇门两代的冤仇!我并没有害死孩子,叫孩子那么样死!”<sup>¶3</sup>(p.633)仇虎对罪过的焦虑其实已经超出自己可以承受的道德底线,并不断出现在其道德自我意识的每一个时刻,焦虑蛰伏在仇虎内心深处,并在黑林子的幻景中一再刺激着他的良知,最终把他驱逐到完全自弃和受谴责的情感中去,他虽然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自己复仇的使命,却陷入了道德绝望的极端境遇。仇虎的道德焦虑其实也是曹禺的,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悖论,绝对的道德意志与绝对的生命意志本身就难以调和。

## 二、“存在”的自由选择与生命的本质充盈

任何存在的人都无法避免生命力的选择,存在主义将现实状态的形成当作是综合背景之下选择的产物,是不可言说也不可推演的,一种果断的、在综合背景下生命力的“选择”。悲剧也是“选择”之下的产物,悲剧人物大凡都要面临两难的选择,但他们往往用一种惊人的、雷厉风行的魄力来征服两难的客观境遇。选择代表了一种行动力,代表了一种灵魂搏击后的最后决断,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To be or not to be”。但选择并非轻而易举,往往会以生命作为代价,正如安提戈涅敢于对抗王命,勇敢地埋葬哥哥的尸骨而被国王判处死刑,悲剧人物往往会为了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怕毁灭。

蔡漪、仇虎以排斥一切、毁灭一切的力量强调它的个性,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选择用最为极端的方式进行自我确证,个性的张力达到并超越了纯粹自我的顶峰后,生命本质获得充盈,但最终也会自我取消。蔡漪必须在贤妻良母的活死人般的生活和强烈的情欲与自由中做出选择,对她而言,任何一种选择的结果都意味着毁灭,或是精神欲望上的毁灭,或是亲情伦理上的毁灭,仇虎亦处于两难的境地,虽然他陷入灵魂的绝望之中,但他懂得,一切斗争、一切屈辱都是必须的。他们无所畏惧的选择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意志力,选择意味着敢于绝望的勇气,意味着对于苦难的超越,选择将悲剧人物真正带入了审美领域。“悲剧之美和给欣赏者巨大美感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中,这种令人惊叹的炽热率真的情感和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挑动人们天性的的好奇心与窥测心,并以保持一段审美距离——自身持有安全感的方式,去观赏这些难得一见的、其自身内部也潜在的地下岩浆喷发的奇观。”<sup>¶8</sup>(p.58)

人生首要的就是选择,敢于进入生活,敢于背负责任,敢于成为自己,但是,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自己。克尔凯郭尔的人生“三阶段”论指出,一般人没有成为自己,大多数人沉浸在“群众”状态中,对于自己必须成为自己的任务一无所知。克氏称这种状态为“伦理”状态。有的人感到了人生中要成为自己但同时又不得不生活在有限、相对的处境中的荒谬,这些人面对荒谬感到很痛苦,于是努力逃避它,以一种不肯投入生活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整体性,克氏称之为“审美”的状态。只有少数人感到荒谬又敢于面对荒谬,最终在一种面对荒谬的恐惧与战栗中投身其中,达到“信仰”,跨越荒谬,成为了自己<sup>[9]</sup>(pp.67-68)。虽说蔡漪、仇虎等并没有达到克氏所谓的“信仰存在”的境界,但他们敢于选择的勇气已经难能可贵,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有生命力强弱之分。如曾文清、高觉新、焦大星等人物就是属于生命力与意志力比较薄弱的群体,他们身上流露的真挚情感、善良天性不免为其命运增添悲剧色彩,但正因为他们不“恶”,缺乏原始蛮性与意志力,不敢为自己进行果敢的行动与选择,所以他们无法成为自己;他们放弃选择,放弃行动,放弃反抗,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悲剧精神,所以,这类人物缺乏悲剧性的审美内涵。伦理道德的善与恶并不是评价悲剧性强与弱的标准,悲剧性是一个审美的范畴,而非伦理的范畴。“如果站在道德、正义的立场,认为道德正义是宇宙普遍的法则,那就无法容忍悲剧的存在”<sup>[10]</sup>(p.100)。因为我们看到悲剧彻底颠覆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伦理法则,从悲剧产生的根源来看,它并不受道德善恶是非的约束,无论好人还是恶人都有可能受难,更何况道德伦理本身就具有相对性,有很强的人为主观因素,它不是一种客观性的标准所谓的善恶,好与坏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完全绝对。所以,如果认为好人受难悲剧性就强,坏人受难悲剧性就弱甚而没有悲剧性,这种简单的判断显然忽视了社会与人性的复杂。

曾文清、高觉新等表面看起来尚礼重教,遵从伦理纲常,具备“善”的品质,但他们放弃独立的意志与人格,因而缺乏悲剧性。悲剧性意味着力的崇高,是一种令人生畏而又令人振奋的力量。相反,专横恣肆的周朴园虽“恶”,却是悲剧性人物,因为在他身上穿透着一股强大的意志力。朱光潜指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如果在他的邪恶当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毅和巨人般的力量,也可以成为悲剧人物”,而“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就是怯懦和屈从”<sup>[11]</sup>(p.132)。周朴园虽是一个专制、残酷的封建家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无人性,他同样要承受家破人亡的悲剧性结局:两个妻子疯了,两个儿子死了,只剩下他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好端端的家顷刻化为乌有,血脉无法得到传承,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他并没有被击垮,而是怀着最为虔诚的忏悔一直活下来,这足以证明他并非懦弱之人。如果他完全冷酷无情,倒不会激发观众的怜悯,可是他也念侍萍的旧情,甚而要让她周萍认母,这样的温情举动会让人暂时忘记他的自私与虚伪,人性当中“善”的一面暂时压倒了“恶”的一面,曹禺对周朴园进行这样的刻画的确显现了人性的深度。除了周朴园,另一个让人震撼的恶人就是焦瞎子。她与仇虎的精神搏斗是《原野》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她仿佛是希腊悲剧中的神谕,仇虎的一切举动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她一直在努力试图挽回焦家的命运,她为了收拾焦阎王的残局,保护焦家的子息命脉,也曾流露出忏悔的意思,可最终还是徒劳,她的城府和心计在与仇虎的原始蛮性的抗争中败下阵来。显然,她也不是一个弱者,起码可以与仇虎势均力敌。如果说周朴园以其身上偶然散发的人性光芒打动了观众,那么,焦瞎子无疑是凭借她顽强的母性的生命意志力让观众惊惧。

悲剧总是无限接近冲突爆发的那一瞬间,在这之前,悲剧人物必须要具备直面无悔地选择以及承担必然后果的勇气。悲剧的每一个高峰都是一个顶点与边界,这是生存与死亡之间的交叉点。悲剧边界的二重意义在于它既是一种实现,又是一种失败,极端的自我确证最终会导致失败与死亡,但这是纯粹的肯定生命意义的死亡,虽然生命在万般炫目的燃烧之后将皈依于永恒的宁静,但是生命本质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盈。这体现了用生命力进行选择的意义,同时也蕴涵了悲剧精神的真谛。

### 三、存在的“人”与人的“存在”

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显然与希腊人不同。希腊人的“存在”相对比较单纯,因为希腊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海洋性民族,崇尚精神自由,独立性很强,但它的伦理规范、社会关系发展得并不健全,而且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感”特别强烈,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史诗背景中,即使个人能发展,仍旧要依赖国家、家庭与命运的坚实基础,更何况希腊众神总是以一种与人类对立的姿态出场,他们威慑无边的力量让人无法逃离命运的掌控。而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则体现了一种与希腊悲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体现在悲剧人物的“存在”无法逃避由道德伦理以及一系列基本规范所编织的社会关系之网,悲剧人物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关联也并不是如此密切,命运因素隐含其内,而不像希腊悲剧一样直接张扬神谕的力量,体现为一种无法抗拒性,对于一个讲究现世功利的民族来说,中国人也信命,但更多的是在走投无路时寄希望于命,或者以命为自己寻求解脱。

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中的“人”大多是具有高贵身份的英雄,他们的毁灭不仅是自己行动的结果,而且带有为整个人类受难的性质,体现了个体与普遍性的冲突,因而,希腊悲剧里总是洋溢着英雄主义精神。而曹禺笔下的悲剧人物都是日常小人物,他们的毁灭大都是由于自己的选择与行动所造成的,体现了一种纯粹个人的因素。这意味着希腊悲剧中的“人”一直作为集体的部分而存在,希望获得集体的肯定,而曹禺悲剧中的“人”则追求自我的确证与肯定。处于三四十年代特定的革命背景之下,悲剧人物与英雄人物似乎显现了更多的共通之处,有些剧作家甚至将两者等同,但是,在那样的现实境遇下一味强调个人英雄,似乎就带有太多政治化与理想主义的乐观色彩,反而会削弱人性的深度与力量。曹禺的特异之处在于他的笔下没有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英雄,他的悲剧不是英雄的悲剧,而是平民的悲剧。

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曹禺的悲剧更多关注人的有限性与罪性,而古希腊的悲剧却力图表现人的无畏性与崇高性。所以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希腊悲剧凸显更多的是存在的“人”,他们总是洋溢着英雄主义的热烈与激情,俯视“存在”并藐视它。如俄狄浦斯王对命运不屈的抗争,普罗米修斯为盗天火于人间而忍受巨大的苦难,西西弗斯为摆脱地狱的煎熬不断推动那块永远到不了山顶的巨石……而曹禺给予更多关注的似乎是人的“存在”,他暴露存在的困境。现代社会中的人面对“存在”似乎不能再自信满满,人陷入了“存在”这个巨大的黑洞般的困境。尼采说:“我漫步在人间,如同漫步在人的碎片和断肢之间,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sup>[12] [p.205]</sup>曹禺认识到人在“存在”中的卑微渺小、沮丧无力,人的抗争与失败都是那么迫不得已,全然没有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主动受难的气概,剩下的只有被动与绝望之后的茫然。但是,曹禺并没有如西方现代悲剧那样在暴露存在困境的同时就完全否定人存在的意义,反之,存在主义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如加缪对西西弗斯的悲剧就做了另一种解释,他试图说明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注定遭受莫名其妙的折磨,个人虽可以进行反抗,却如西西弗斯一样,永远不能获得成功。在存在主义的笔下,人失去了性灵的崇高与存在的价值,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悲剧中逐渐消失,崇高、庄严的悲剧风格被荒谬与琐碎所取代。

曹禺悲剧表面上凸显了人的存在困境,内中却不折不扣地蕴涵着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基督教强调人稟有上帝的形象并关怀个人的价值,同时它又强调人的沦落与罪性,这两方面构成了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内涵。在大部分国人的心目中,或许认为基督教只重视神性而拒绝人性,所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似乎一直不被认同,它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水火不容。其实,探究曹禺受了哪种人道主义的影响显然没什么意义,总而言之,人道主义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宣扬自由、平等与博爱。而曹禺对存在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着“人”的挑战与“人”的价值实现。与希腊悲剧不同

的是,曹禺笔下的悲剧人物挑战的对象已从自然转向社会,转向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甚至人本身;善与恶的对立已并非是最核心与单一的冲突;“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虽然可以无关乎善恶,但是对立冲突却依旧鲜明。因为“人”永远无法达到作为完全个人的存在,若相信萨特的话:“他人即地狱”,人必须履行作为部分而存在的职责,那么,道德这个世界秩序的法则吗?曹禺对此也倍感迷惘,他不愿意用道德批判与说教来拘束他笔下试图冲破传统道德束缚的悲剧人物,但他也了解道德理性存在的合理因素,他欣赏蘩漪、金子的热烈执著,但他同样对待萍、愫芳、瑞珏等含蓄、隐忍的传统女性抱有恻隐之心,显然,想要摒弃社会的一切道德约束去张扬人性是不现实的,这反映了曹禺复杂和矛盾的心态,这种矛盾心态贯穿了曹禺创作的始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曹禺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倾向性,他在前期的悲剧作品中对于道德秩序有着明确的质疑,而在后期作品如《北京人》、《家》里,又出现了向传统道德回归的倾向。显然,曹禺后期关于道德社会的愿望带有实用理性的色彩,这决定了他与悲剧的逐渐疏离。

人类的悲剧意识产生于对“存在”的反思,关于存在这个带有抽象意味的终极命题,似乎与中国人骨子里乐天知命、追求普遍和谐的观念极不相符。西方人由于强调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因而始终处于一种万物分裂的紧张关系之中,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基督文化的渊源,他们了解作为有罪之人“存在”的悲剧性境遇,他们意识到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他们有深沉的悲剧意识与人生的悲剧感受。而中国人由于神性形态的缺乏和宗教意识的淡漠,西天佛祖只是供奉在庙堂寺院供人膜拜而没能走出神龛深入民众心灵,孔子形象始终是俗世伦理道德的典范,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就没有西方文化的神圣存在和终极实体。像曹禺始终高扬“人”的旗帜,关心着“人”在存在中的命运以及灵魂的反抗挣扎,执著于那样对生命本体和神圣存在意义的追寻,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凤毛麟角。受基督精神影响颇深的曹禺向世人展示了悲剧人物的抗争精神,并给之以道德的宽容,他肯定他们的悲剧精神,但是在悲剧的背后,他也在思索人应该如何理想地存在:用极端的方式来自我确证还是遵从伦理教条这样的道德存在?更或是应该进入爱与信仰的存在?无论如何,曹禺始终渴望人能从此在的罪性中解脱出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存在”世界,并能够诗意地栖居。所以,曹禺的终极指向仍是存在的“人”,他拥有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

### [参 考 文 献]

- [ 1 ] 黑泽尔·E·巴恩斯.冷却的太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 2 ]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A].曹禺.曹禺研究专集:上[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 [ 3 ] 曹禺.原野[A].曹禺.曹禺文集:第1卷[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 [ 4 ] 索伦·克尔凯郭尔.古老的悲剧主题在现代的反映[A].程朝翔,傅正明.悲剧:秋天的神话[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 [ 5 ] 蒂利希.存在的勇气[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 [ 6 ] 曹禺.雷雨[A].曹禺.曹禺文集:第1卷[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 [ 7 ] 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 8 ]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 9 ] 李钧.存在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 [ 10 ] 程亚林.悲剧意识[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
- [ 11 ]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 [ 12 ] 尼采.尼采全集:第6卷[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The Existing Human and the Existence of Human

## ——A Study on the Idea of Existence in Cao Yu 's Tragedies

CHEN Jian , JIA Mi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

**Abstract** : Cao Yu 's tragic consciousness comes from his profound thought about Mankind 's "being". Ever since they were born , people frequently can 't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tragic situations and anxieties , even though they choose action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to prove their existence. Tragedy is the highest form of being , the essence of the life will be full with the extinction of the flesh.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xistence , Greek tragedies emphasize on the heroism and fearlessness of the heroes , but Cao Yu 's tragedies choose to expose people 's difficult positions. However , Cao Yu hadn 't brought in the western existentialists who den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fe.

Karl Jaspers once said people who had situation consciousness would have the sense of being. Cao Yu 's earlier plays , concluding *Thunderstorm* , *Sunrise* and so on , all express a kind of situation consciousness. What on earth does "situation" mean ? It means restriction on morality and ethics. It means the fatal power which can 't be explained with any reason , and it also means all the factors dissimulating the human 's essence. Related to the tragic situation is human 's anxiety. Fan Yi was in anxiety because she couldn 't have love and prove herself ; and Qiu Hu 's anxiety of guilt and condemnation came from the threat of morality and ethics.

No one can avoid the choice of vitality , and tragedy is the result of the choices. The characters in the tragedies face dilemma of choices , but they are always able to conquer the subjective situations with astonishing power. For example , Fan Yi and Qiu Hu managed to prove themselves in a most extreme way. Their characteristic tension transcended the peak of the absolute center of itself , and the essence of life had been filled , but also eliminated. The dual significance of the tragedy boundary lies in that it is not only a success but also a failure , and the extreme affirmation leads to failure and death , but the essence of life will be achieved. This not only embodies the fin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oice of vitality , but contains the true value of the tragic spirits.

Most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Greek tragedies are noblemen. Their ruins are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ir own actions , but also the sufferings for the whole human being. This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universality. But the characters of Cao Yu 's tragedies are all common people , their ruins are caused by their choices and actions instead of sufferings. Affected by Christianity , Cao Yu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mitation and the guilt of people compared to ancient Greek tragedies that emphasize fearlessness and sublime. Cao Yu was constantly exploring how human should exist. Should He affirm himself in an extreme way. Should He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morality and ethics as the ultimate principle or enter into the existence full of love and faith? His true aspiration , however , is that human could be freed from the guilt and establish an poetic existence in an ideal world.

**Key words** : situation consciousness ; the anxiety of being ; the choice of vitality ; human and existence